改革论坛

提升“中国粮”竞争力需降成本补短板

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但粮食领域的高成本、低效率、创新能力不足、供需不匹配等发展瓶颈日益凸显。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中国粮”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之一。

□刘丽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联合编制发布的中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2016年三季度报告显示，全国夏粮总产量13926.0万吨（2785.2亿斤），比2015年减产162.1万吨（32.4亿斤），减少1.2%。不久前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三农”工作方向，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基础上，着力优化产业产品结构。2004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但粮食领域的高成本、低效率、创新能力不足、供需不匹配、生产服务滞后及体制机制束缚等发展瓶颈日益凸显。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中国粮”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之一。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提高竞争力

首先是稳步推进规模化经营，降低生产成本。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这一底线基础上，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规范流转。通过土地入股、土地托管、生产合作等形式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促进粮食种植从传统的农户分散经营向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经营体系转变，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单位粮食生产成本。

其次，利用“互联网+”，降低物流成本。农村电子商务如今已进入多元主体联合驱动的成长期，平台型农产品电商已超过3000家，有力促进了农村物流发展。引导农资及粮食流通企业发展专业化的农资销售、粮食仓储和物流业务，在县域范围内整体推进农村物流配送，与省、市级物流接轨，可以切实提高农村物流效率。

再次，发挥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提高生产质量。全国283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40%，高标准农田占比为53%，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生产经营实现了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排头兵。“十三五”期间，应强化园区辐射功能，引领周边地区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开展精准化、智能化生产，向供应链两端延伸。同时强化源头管理和风险管理，加快质量安全溯源、风险评估与粮情预警体系建设，大力提升生产质量。

在补短板上下功夫 提高“中国粮”综合效益

一是补技术短板。鼓励粮企自主研究和推广应用行业共性科技成果，支持粮企与科研单位协同攻关，尤其是重点加强粮食收储加工安全保障支持技术、副产物加工新工艺和稳定化技术、粮食产品营养品质及米面主食品产业标准体系研究。应鼓励农机企业加大创新力度，推进动力换挡和无级变速拖拉机整体制造体系的升级以解决高端农机市场供给不足问题。

二是补粮企和粮农短板。面对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的新需求，粮企要丰富和提高粮食产品的绿色和营养水平，推动粮食生产向品牌化、个性化、定制化方向发展。倡导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培育集粮食生产、仓储、物流、加工、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充分挖掘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粮食产业链再造与分工。新老粮农的共同需求是尽快提升知识及技能水平，应加强对粮农的职业素质培训及网络、移动终端、电子商务等技能培训，提高粮农“智慧型”生产的能力及水平。

三是补服务短板。2015年农业电商融资和重组蓬勃发展，各类融资超70亿元。借此势头，各地应尽快健全农业电商多元化投融资机制，落实电商发展的用地、用水、用网政策，扶持垂直型农业电商发展，促进粮企、粮食批发市场与电商融合，打造“粮食网络经济”。此外，要通过打造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四是补体制机制短板。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与保护粮农利益并重，改革完善粮食收储制度；创新粮食收购方式，引导企业与各类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对接，开展订单收购、代收代储、代加工等个性化服务，构建新型粮食收购网络体系；健全市场调节机制，探索建立口粮价格与保险、成本、补贴及国际市场价格联动的国内粮食支持保护政策体系。

（作者为辽宁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

现象评说

不能以“大干快上”思维解决复杂民生难题

民生工程，是建给老百姓过日子的，不是给谁看的，来不得半点“花活”。只有切实摒弃政绩思维，坚持从民所愿，才能真正把民生工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办成实打实的民心工程。

□施维

寒冬时节，在内蒙古西部某旗石宝镇前坤兑滩村，零下20℃左右的气温中，很多村民却只能在毛坯房里受冻。据新华社报道，这里正在推进中的农村危房改造，由于多次停工、迟迟未能竣工，致使46户群众不能如期住进新房，13户农民寄住邻居家，部分群众无奈搬进毛坯房，“晚上冷得睡不下，早晨冻得起不来”。

一项“民生工程”缘何让群众受冻？原来是因为：没钱。据该旗旗委农村牧区工作部工作人员介绍，仅当地石宝镇就涉及23个村的危房改造建设项目。旗财政一下子拿不出巨额资金，需承包方垫资，因资金跟不上，工人干几天拿不到钱就走人，总在停工。有农民反映，该镇另外几个村的危房改造项目也未按期竣工。

好心办坏事，民心工程成“糟心工程”，这样的事情并不在少数。应该肯定的是，当地政府希望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的出发点是好的，导致工程拖延和质量缺陷也不是某些类似事件中的权力寻租。但也正因此，才更值得我们思考，其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才更值得关注。

据了解，该旗去年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才15.4亿多元，而单项民生工程投资就达15亿元；各项工程短时间内大量集中上马，客观上又抬高了人力、物力成本，更加剧资金紧张；违规采用施工方垫资，又导致欠薪问题的发生……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大干快上”的搞法。客观上，以这样的工作方式去建设民生工程，在有的时候有些地方，确实有利于在有限的时间里解决问题、完成任务、推动发展，但是更多情况下，由于其先天不足、后续乏力，很容易陷入形式主义、政绩工程的泥潭中。

当前，随着“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许多地方都纷纷加大了对民生工程的建设力度。尤其在扶贫攻坚过程中，很多贫困地区其道路、住房、卫生室、光纤入户等基础设施都是重要的考核内容，民生工程建设更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上面有要求、群众有期盼、地方也有政绩冲动，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难免不会出现不顾客观实际、发展规律，贪大求快的搞法。

笔者日前去西部某贫困地区采访，某市官员说，该市2015年一年修建的道路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当地所有道路建设的总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自然也意味着非常大的一笔投入，据了解主要是靠银行信贷的支持。但是，笔者存在这样的担心，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巨大的债务以后将如何偿还？这么短时间里这么大的工程，质量能否保证？路修好后，后续的保养、管理依然需要投入，财政能否支持？这些问题不能全丢给后来人。

老百姓常说，“有多大的头带多大的帽子”“一口吃不成胖子”，这些话听起来糙点，但道理是实在的。不能说因为我是为老百姓服务，为老百姓办事，就可以不尊重客观规律、不顾相关政策要求，盲目“摊大饼”搞建设。搞民生工程、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民生工程建设，必须要处理好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之间的关系。既要解决好当前必须解决和能够解决的民生问题，又要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可持续承受能力，干一件成一件，办一件是一件。

当然，不能用“大干快上”方式解决民生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干事、少干事。基层政府责大权小，这要求我们未来要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县级政府的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投资和服务能力。同时上级政府和管理部门也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考评机制，少听汇报，多询实绩；少看数字，多问民意。

另外，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一方面要积极谋求更好的发展，壮大自身财政实力，同时要学会“弹钢琴”，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既要分清轻重缓急，又要懂得统筹兼顾，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分类有序推进各项民生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创新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机制，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各种信贷、政策工具，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小财政也可以办大民生。

说到底，民生工程，是建给老百姓过日子的，不是给谁看的，来不得半点“花活”。只有切实摒弃政绩思维，坚持从民所愿，才能真正把民生工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办成实打实的民心工程。

各抒己见

乡村发展离不开年轻知识群体

□朱昌俊

当“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成为青年人群体中两种声音时，“80后”林炉生已经完成了北上求学——留京工作——离京返乡——公益创业——再度北上深造——扎根乡土的历程。离开北京，回到福建，投身乡村建设，他称之为“离开北上广，重建桃花源”。

支教、创办公益机构，然后再返乡修缮土楼，办书院，照顾留守儿童，复兴乡村文化建设。林炉生的人生，展现了一个非典型的“80后”样本。时下选择“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并非个例，但这种选择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相较而言，林炉生选择将个人志向与乡村现实相结合，内含着一种个体革新和社会革新的意义，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由农村跳往城市，由小城市走向大城市，这是社会为当前多数青年人所设定的人生路线。年轻人的这种“晋升”方向，固然是城镇化浪潮中的一种必然趋势，但也凸显了年轻人生活标准与活法的窄化。从文化多元、生活方式丰富角度看，代表社会活力的年轻人受制于单一化的选择之中，无疑是让人深思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是让每个个体都能拥有更多自由选择的可能。然而在今天，像林炉生这样的年轻人太少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称赞他跳出世俗化人生“套路”的同时，也不得不有所反思，如何从社会外部环境的改善上，让年轻人有多样化的人生选择。

林炉生的选择，不仅诠释了生活的另一种方向，也打开了乡村转型的另一种可能。在原有的乡村人才结构被消解的情况下，乡村的重建势必依靠外部力量的输入。而要实现这一点，年轻人的回归显得至关重要，特别是像林炉生这样有“技能”、有想法又敢于践行的年轻人。

最近热映的一部电影《驴得水》中，四位知识分子从大城市到乡村开办学校，希望改变民众的贪、愚、弱、私，但最终因自视甚高的教化心理和外力的干预而失败。与电影不一样的是，林炉生凭借自身对于家乡需要的深切洞察和自己所学的知识，带动村民和外部资源一起致力于乡村的重建，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我们历来有着乡贤文化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像林炉生这样的年轻人，就可以称作新时代的乡贤。他们与传统的乡贤不同，因为掌握了最新的知识，既能够给乡村带去新的活力，又能为外部资源的进入牵线搭桥，因而更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起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于积极地创造新文化。”这一理念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其实仍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而要让乡村积极地创造新文化，离不开年轻知识群体对于乡村的助力。当然，前提是要通过制度与环境的革新，鼓励更多的林炉生留下来，成为新乡贤。